

ZHONGGUOGRENYUNDONGSHIYUANJIU30NIANWENXUAN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

30年文选

刘功成 著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 30 年文选

刘功成 著

© 刘功成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30年文选 / 刘功成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205—07041—0

I . ①中… II . ①刘… III . ①工人运动—历史—中国
—文集 IV . ① K26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5477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http:// www.lnpph.com.cn](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210mm × 285mm

印 张：35.75

字 数：1150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丽竹

封面设计：杨 勇 白 咏

版式设计：王珏菲

责任校对：王绍斌等

书 号：ISBN 978—7—205—07041—0

定 价：50.00 元

序

林 伟

刘功成先生而立之年以降，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事业，放弃自幼喜好且已初获成就的文学，心无旁骛，专意治史，孜孜不倦，拓荒垦野，笔耕30载，公开出版20多本书，发表百余篇文章，付梓合计500余万字，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颇多建树，成就斐然。特别是在中国五一运动史、中国职工合理化建议活动史、大连地方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和工会志编纂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国内外没有能过其右者。

先生拓宽和加深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领域。他把中国五一运动史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分支，钻研数载，公开出版《中国五一运动史》一书，填补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开创了中国五一运动史学科领域，成为中国五一运动史研究的奠基人。他编著的《合理化建议活动的兴起》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合理化建议活动》两本书，以新发掘出来的大量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搞清了中国职工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源流和发展走向，及其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是这个领域研究的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学术成果。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中国职工合理化建议活动纪念日——1947年11月30日。他对产业工会和行业工会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与对策的研究，视野广阔，注重从历史的深度，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理论高度，探索昨天、今天、明天的内在联系，提出更好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的建议和主张，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多次应邀在全国性专业会议上作学术报告，论文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成为公认的这一领域研究的带头人。他先后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中国工运史学科概念及其内涵简论》、《简述中国工人运动史独立学科的形成》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性质异说》、《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初探》等数十篇论文，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学科建设和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成一家之言。他在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方面建树的十余项“第一个”和丰硕成果完整地体现在其专著中，从本书的《中国五一运动史、工运史研究文稿》中可窥一斑。

先生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立足于地方。他是大连地方工运史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先后出版《大连工人运动史》、《大连市工会志》、《大连工运著名人物》、《大连工会要略》、《大连市工会代表大会文献》、《大连工运史话》和《大连市工会年鉴》（1992～2002）等近20本地方工运史书，基本廓清大连工人阶级队伍自1880年产生以来的130年、大连工会自1923年建立以来的85年的历史；践行了他20世纪80年代末在“全国工会院校工运史教学研讨会”上提出，并一直坚持的“完善中国工运史教材，首先需要编好地方工运史，只有编好各个城市的地方工运史，才有可能形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工运史教科书”的主张；兑现了他“不搞清楚大连工人运动史，死不瞑目”的誓言。专家赞其为“大连工运研究丰碑的树立者”、“著名地方志学者”，媒体誉其为“抢救历史的人”、“著名历史学家”；有学者指出：“功成先生的工运史研究归结起来可用‘系统、完整、严谨、深刻’这八个字概括。他研究工运史不是做一事一记的简单表象记录，而是把大连工人运动放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工运史的大环境中去研究和记录，体现出一种开放的学术心态”。（王万涛：《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工人运动史研究文稿〉代序》）这个评价，一语中的，甚得要领。无须去读《20世纪大连工人运动史》、《工人运动史研究文稿》等先生的专著，即使仅读一读本书中的《大连工运史、地方史研究文萃》，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先生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和写作有独到的学术见解。他依据工会学原理，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科学的工会史、志、鉴编纂的体例，建立了特色鲜明的地方工运史书和工会志书及工会年鉴的框架结构。其专著《大连工人运动史》（1879～1949年）和《地方工运史专著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等论文在上世纪80年代末问世后，对当时的地方工运史书的编撰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其工会志编纂和工会年鉴编撰的理论核心是“x+4模式”（工会自身建设+四项职能活动），《工会志模式述论》、《论工会志不宜设“工人状况篇”和“工人运动篇”》是其这方面理论的代表作，在“全国首次工会史志编纂研讨会议”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出版的《中国地方志》及全国工会《职大学报》上交流和发表后，被一些省、市的修志工作者所借鉴，有的专程登门拜访和请教。他主编的《大连市工会志》（1923～1990年）和《大连市志·工会志》（1923～1990年）则是其关于工会志编撰理论的实践成果。《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专题报道。《辽宁日报》曾以《中国工会第一志》为题报道：“中国当代方志学著名学者、大连工人大学副校长兼大连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副校长刘功成主编的《大连市工会志》（1923～1990年）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公开发行……行家认为其内容和形式均居全国已出版的同类志书的一流水平，称

其为‘中国工会第一志’。”

先生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不是停留在故纸堆里，而是升华到存史、资治、教化的高度。他努力推动“把工运史工作列入工会经常的重要业务”。1986～2006年，他在大连市总工会常委会的支持和领导下，先后制订4个大连市工运史工作的五年规划，组织召开9次大连市工运史工作会议（两年一次），总结、选树、推广工运史工作先进集体50多个、工运史研究先进工作者百余人；建立和完善了以工会史志鉴编纂为基础，以工运史研究成果服务于现实为重点，以工会工作资料积累为日常业务的工运史工作秩序。大连市总工会和辽宁省总工会先后加以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工运史工作的开展，使大连市的地方工运史研究和工运史工作走在全国各城市的前列。他还以新发掘出的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建议确立大连市工会建会纪念日（1923年12月2日——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日），得到工会领导机关的确认，为大连工人阶级增添了新的节日，对工人阶级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夺取新的胜利，不断起到激励作用。

先生学识渊博，文史根基深厚。主攻工人运动史，旁及近现代史和写作学。他在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出版的专著《李鸿章与甲午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全国较早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地位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在大连建市100周年时出版的专著《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1894～1945年）一书，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可喜收获。他在大连工业大学和大连市工会干部学校授课的讲义《论文写作通论》一书出版后，曾被全国多所高等院校采用为教材。他的《左传》研究，有独到的视角，公开发表《论中国小品文的滥觞——兼论〈左传〉“君子曰”的文体贡献》，找到了中国小品文的源头，是传统文体研究的一大收获；《“君子曰”是〈左传〉作者论从史出的表现方法》、《浅论〈左传〉“君子曰”的思想性》，立论精辟，非同凡响。《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著名华人艺术家辞典》、《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等文学艺术家辞典均收录其姓名及其文学作品（篇名）为辞条。从其工作笔记选录——《30年工运史研究文余》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非同一般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

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工运史学者、专家、教授，名播海内外。《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余家传媒对其科研成果和业绩多次做过报道。《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优秀专家大辞典》、《中外名人录》、《世界名人录》等40余部权威的大型辞书收录其姓名和业绩为辞条。他曾长期担任大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主任、大连市工会干部学校副校长、大连工业大学副校长、大连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大连市工人运动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却从不张扬，从不以史学家、名人、领导者自居，一向低调行事，不肖仕途，不谋升迁，一心扑在工运史研究上，终于在很少有人问津的茫无边际的沙漠上开拓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有句名言：“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品行，荣获全国工会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辽宁省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大连市劳动模范等桂冠，收到海内外邀请函、聘书、约稿信等飞鸿数以千计。

先生用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 30 年时间，执著地做一件事——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他把自己的荣辱沉浮乃至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都与工运史研究融为一体。30 年来，他不论严寒酷暑，没有 8 小时工作日和星期天、节假日休息的概念，长期平均每周伏案耕耘 10 个工作日的时间，耐住清贫，耐住寂寞，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都以顽强的毅力，毫不动摇地任劳任怨地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奉献着智慧和力量。《老子·德经》云：“大丈夫处其得，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先生是也。余与先生共事十载，近些年为先生副职，深知其治学之严谨，造诣之深厚，为人之耿直，正气之凛然，堪为今之学人楷模。故当荟萃其大半生精华之作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 30 年文选》即将付梓，先睹为快，并为是序。

庚寅冬至

目 录

序 林伟

中国五一运动史、工运史研究文稿

李大钊与中国五一运动史	(3)
——兼为纪念《“五一” MayDay 运动史》发表 80 周年	
对张浩《我所过的五一》一文中两个时间的订正	(6)
中国五一运动略史	(9)
中国工运史学科概念及其内涵	(114)
简述中国工运史学科的形成过程	(117)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性质辨析	(119)
邓中夏到大连时间考	(121)
大连中华工学会会歌是李立三所作	(124)
五四运动在大连	(125)
五卅运动在大连	(128)
——兼论大连地区大革命高潮	
关于“四二七”大罢工坚持的时间与复工条件考	(142)
中国工会的产业原则及产业与地方相结合组织领导原则的确立	(144)
新中国产业工会的兴起、低迷、恢复、改革滞后及其原因研究	(152)
中美行业工会历史比较研究	(162)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30年文选

中国职工合理化建议活动的兴起	(175)
——从大连到全国的发展	
附：前苏联的早期合理化建议活动	(186)
——从“生产合理化”到“斯达哈诺夫运动”	
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职工合理化建议活动	(190)
建立和完善企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简论	(195)
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初探	(202)
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奠基石	(206)
——六次劳大确立的工运方针的回顾与解读	

大连工运史、地方史研究文萃

大连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及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历史贡献	(215)
大连工人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	(225)
“拒俄运动”中的大连工人斗争	(228)
日本统治时期的大连工人运动	(230)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及其在辽东租借地的主要活动	(299)
大连日本人劳动组合述略	(369)
大连市推行集体合同制度的历史不应被遗忘	(374)
大连百年工人运动的三个高潮及其特点	(379)
大连市工会建会纪念日的由来	(382)
——在纪念大连市工会成立 85 周年暨改革开放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百年沧桑话大连	(384)
大连市得名于大连湾（《百年沧桑话大连》续一）	(386)
“大连多半是旅顺”（《百年沧桑话大连》续二）	(388)
李鸿章与旅顺开发述论	(390)
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旅顺之战	(393)
惊骇世界的日军旅顺大屠杀	(396)
李鸿章与中日甲午大连湾防务	(398)
沙俄租借时期大连城市与工商业初探	(400)
刘家店民众反俄抗税风潮	(403)
乔德秀谋教育救国	(405)
收回旅大运动	(407)

救国会庄河举义旗 六君子抗日抛头颅	(409)
留希科夫之死秘话	(411)
“搬家运动”	(413)
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415)
大连献给共和国的第一份厚礼——工业展览会	(417)
大连历史上最欢腾的日子	(419)
——回忆新中国成立群众庆祝宣传周	
工人阶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422)

工会史志编撰、工运史工作研究文摭

工会志模式述论	(427)
论工会志不宜设“工人状况篇”和“工人运动篇”	(432)
工会志因事系人八法	(436)
——《大连市志·工会志》琐议	
工会志《人物》设置散论	(443)
——10部工会志《人物》述评	
《大连市工会志》跋	(451)
地方工运史专著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454)
——在辽宁省总工会第七次工运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20世纪大连工人运动史》跋	(461)
《大连市工会年鉴》编辑说明	(464)
《大连市工会代表大会文献》跋	(466)
《合理化建议活动的兴起》跋	(468)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合理化建议活动》跋	(470)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跋	(472)
《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跋	(475)
《中国五一运动史》跋	(479)
《工运史话》(大连历史文化丛书一)概述	(481)
《工人运动史研究文摭》后记	(483)
《论文写作通论》后记	(486)
把工运史工作列入工会“经常的重要业务”	(487)
——在辽宁省总工会第九次史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 30 年文选

适时实现大连市工运史工作重点的转移	(491)
——在大连市工运史工作委员会二届一次委员（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重温中国近代史 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	(493)
——在大连市政协纪念鸦片战争 15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国难国耻 永矢不忘	(495)
——在“旅顺万忠墓纪念馆”的演讲	
面向新世纪 迎接新挑战	(497)
——在大连工人大学庆祝教师节大会暨 2001 — 2002 学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关于修改《大连市工人运动学会章程》的说明	(499)
——在大连市工人运动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大连市工人运动学会 2006 年工作总结与 2007 年工作要点	(501)
——在市工运学会四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30 年工运史研究文余

1980 — 2010 年工作笔记选录	(509)
---------------------	-------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 30 年文选

中国五一运动史、 工运史研究文稿



著者（右）首次会晤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第一大家、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明途

李大钊与中国五一运动史

——兼为纪念《“五一” MayDay 运动史》发表 80 周年

中国五一运动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是这一运动最卓越的组织者和最优秀的领导者。1920年5月1日，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上发表的《“五一” MayDay 运动史》一文，是中国五一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吹响了中国五一运动的号角，指明了中国五一运动的正确方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揭开了中国五一运动史的第一页。

1919年至1924年，李大钊每年都撰写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动中国五一运动的兴起和健康发展。1919年5月1日，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期“专号”上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节” Mayday 杂感》一文（署名“守常”）。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5月1日是工人“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取得成功的日子，是“工人的祝典日”。他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谈到一百年前诞生的马克思，谈到“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预言：“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做了工人，那一年的5月1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著名学者，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他在《“五一节” May Day 杂感》中提出的工人“直接行动”的观点，不仅播响了中国五一运动的战鼓，而且发出了一个伟大的动员令，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号角。在此之前，虽然哈尔滨等地的工人有过纪念“五一”的活动，但只是局部的独立的行动；广大的中国工人群众还不知道有自己的节日，更不知道用“直接行动”来纪念它。《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之后，经过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宣传，中国的广大工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自己的节日，才知道怎样纪念它。从此，“五一节”才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一年一度的固定节日，才年年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举行纪念活动。

李大钊是伟大的革命预言家。1920年5月1日，我国有近10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参加的工人总计五六万人。他们第一次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集结到李大钊高高举起的革命旗帜下。这一天，《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七卷六号），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 MayDay 运动史》一文。大钊同志在文章中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多年来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个日子里进行的英勇斗争，热情讴歌了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们。文章号召：中国工人“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五一运动应该是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不应该“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应该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不应该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李大钊还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空喊“劳工神圣”，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发动群众的工作。

其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工人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渴望了解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渴求理解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因此，李大钊《“五一” MayDay 运动史》的发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受到广泛的欢迎。各地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和《东方杂志》，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全文转载了《“五一” MayDay 运动史》一文。

李大钊还亲自领导了北京地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活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是 1920 年中国北方“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北大学生 5 月 1 日举行罢课。上午 9 时，校工和学生 500 多人在北京大学二院礼堂召开纪念会。李大钊在大会上讲话。会上散发了传单，号召人们“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向光明的地方去。”这些传单是李大钊“费了几天时间”写成的，“同时还寄往南口、石家庄、唐山等处工厂散发。”同一天上午，得到李大钊帮助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等 8 人，雇了两辆汽车，分头到东城和西城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他们沿途高呼“劳工万岁”等战斗口号，宣传车前悬着“五一万岁”、“劳工神圣”等鲜红的横幅，“车后还竖着面表现革命精神的赤旗”，十分引人注目，在全市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为此，反动军警分别在骡马市和王府井阻截了这两辆宣传车，将车上的 8 名学生逮捕。同日，李大钊指导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 50 人，分成 5 个组，于上午 10 时从学校出发，沿街进行讲演。他们分别宣讲了《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听者颇多”，精神甚为热烈。

李大钊把中国五一运动作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早在同年三四月间，便安排北大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邓中夏等进步知识分子到长辛店和唐山的铁路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同史文彬、邓培等进步工人建立了联系。5 月 1 日，邓中夏赶到长辛店，向 1000 多名铁路工人作了演讲，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受到热烈的欢迎，集会的工人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中国北方最早的工运领袖邓培在“五一”前的星期六晚上，乘火车到北京，接受了李大钊对“五一”活动的指示，将一批《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带回唐山，在工厂里召开了有几百名工人参加的纪念会。这是长辛店和唐山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5 月 1 日，北大学生散发了数千张《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第二天，一些报纸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指出：各地散发的宣传品，“以北大劳动纪念会所印之《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确实如此，这个《宣言》不是空喊“劳工神圣”一类词句，而是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目前要求和长远奋斗目标。它告诉广大劳动群众：从今以后，要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的一切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收回在我们手中，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的劳工朋友啊！快快起来”。这些精神同李大钊在《“五一” MayDay 运动史》中所阐述的革命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它表明经过大钊同志的传播，北京的进步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了五一运动的意义，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反动统治当局对此惊恐不安，“五一”前后，北洋军阀政府一面张贴布告，恫吓群众，一面派出鹰犬，加紧巡逻。5 月 1 日，在前门出动三千多名军警，捕去何孟雄等 20 多名学生。经李大钊多方营救，联络 8 校的校长联名保释，好不容易才使学生获释。

1920 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中国五一运动大大推动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进程。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北京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按照李大钊的指示，不顾反动派的阻拦和迫害，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革命活动，同年 10 月便建立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年五一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及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张国焘等，都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

1921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李大钊指示邓中夏等人帮助长辛店铁路工人史文彬，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工人俱乐部”。5 月 1 日，长辛店的千余名铁路工人隆重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市内一些工厂和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以及邓中夏和北京大学“国民教育演讲团”的一些成员，应邀参加大会。大会通过了成立长辛店工会的决议，举行了盛大

的示威游行。工人群众的欢呼声“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倒了”。同日晚上，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会长邓培，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组织本厂工人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师生，在该校礼堂联合召开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邀请唐山地区一些厂矿的工人代表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讲演，并向与会人员散发了《五月一日》、《我们的胜利》两种小册子。上海、汉口、广州等地也在这一天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李大钊关于中国五一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1921年7月23日，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中国诞生了。

李大钊非常注意在五一运动中增强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1922年5月1日，大钊同志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上作了讲演，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强调指出：五一“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士把“五一”当作一种时髦来庆祝。如1920年的“五一”纪念，除北京、唐山、长辛店、上海、湖北是在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下进行的，其他各地的活动，大都是在资产阶级的组织下进行的。他们纪念“五一”，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标榜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扩大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趁机散布“劳资合作”的论调，麻痹工人群众的斗志；对此反动统治者当然不表示反对。广州、九江等地当局还派出军警加以保护，反映出这种“五一”纪念的虚伪性。李大钊为端正中国五一运动的方向，大力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和引导，他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是各国“工人表示态度的一日，——表示奋斗的态度的一日”，中国工人阶级应该用斗争来纪念“五一”节，不应该去为资产阶级“调合”营垒而庆祝。最后，他提出要把“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口号，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

在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五一运动从一开始便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的出现。据统计：1922年，全国建立起较有影响的地方工会和地方产业工会有百余个，拥有会员八九十万，全年罢工近百次，参加罢工人数达21万，因而这一年有“中国劳动运动纪元年”之称。

1923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工人国际运动的起源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章结尾指出：“吾信工人的国际运动的联合战线，终有成功的一日。故当本年的劳动节，为介绍工人的国际运动略史如此。”表达了对中国五一运动的关注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必胜信念，这对“二七”惨案后处于低潮的中国工人运动，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24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二十四期上发表了《这一周》。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一周有好几个纪念日。（一）是‘五一’纪念日。这是世界劳动者，为减少过度的工作时间向资本阶级进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个国际的工人的日子。全世界的劳动者，在这一天都要举行一个壮烈的示威运动。我们中国的劳工阶级，在今天应该深深感知这个纪念日的国际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全民众，应该在这个纪念日加添些民族的意义。”这就是中国特色五一运动，即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及一切劳苦平民，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的“民族革命运动”。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通过了这个“民族革命运动”的纲领，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掀起了中国人民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李大钊对中国五一运动的伟大历史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原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对张浩《我所过的五一》一文中 两个时间的订正

张浩（1879—1942年），原名林祚培，号毓英（育英），湖北黄冈人，1922年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在党内用名林仲丹（仲丹、仲南），1933年赴莫斯科参加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秋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化名张浩，从此一直使用这个名字。他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也是“世界工人著名领导者”。^①

张浩1939年5月1日在延安桥儿沟工人学校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发表的演说《我所过的五一》一文，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研究中国五一运动史的重要文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81年9月，《工运史研究资料》总第19、20期合刊曾全文登载；1986年4月，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100周年，《中国工运》月刊亦曾全文刊载这篇文章。此文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但我认为文中的两个时间有误，恐讹及后学，故不揣简陋，予以订正，或有不当之处，敬祈识者赐教。

首先请看《我所过的五一》一文中的这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的五一我是在哈尔滨过的。在四月中，我被调到东北。在哈时住在一个白俄的旅馆，五一时决定……去打日本领事馆示威。那天韩国人到的很多，大家把日本领事馆打得一塌糊涂。群众正走散时，日本人和中国军队赶到，把两个走得慢的韩国人捕去。其余的韩国人见了都要跟他二人去，结果被捕了30多人，来了一个盲动。

当天晚上就在我房里检讨五一的经验教训，房里拥满了人，不意查店的来了，把门一开以为有人在房开会，就把门反锁起来，派人回去报告，我当时是以贩木商出面的，和他交涉，不肯把门打开。我于是对茶房发脾气要他拿茶来给客人喝。乘机把门弄开，大家一拥走了，只被捕了两个人。^②

我认为文中所述的“一九三一的五一”应为“一九三〇年的五一”之误，其根据主要是：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哈尔滨特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唐宏经（唐韵超）曾在《回忆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③一文中说：

1930年5月以后，满洲省委书记是林仲丹（张浩）。他4月底到哈尔滨指导工作……“五

①贺龙、关向应：《一二九、一二〇指战员哀悼张浩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

②张浩：《我所过的五一》，《工运史研究资料》总第19、20期合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本文所引用《我所过的五一》的文字，均依据此文。

③《革命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